

· 女性文学研究 ·

后殖民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 《我母亲的自传》解析

都文娟

(济南大学, 山东 济南 25002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摘要:《我母亲的自传》因为对后殖民主体问题的关注而呈现出独特的形态,它既承袭又开拓了欧洲自传精神,关注主体问题,但经由不同的策略与道路:家系认同与历史追溯被面向未来的身份缔造所代替;对殖民文化的抗拒代替了向主流文化的认同;摆脱成为生育工具的殖民地女性宿命;在两性与婚姻关系中追索女性主体的独立地位与价值,最终完成主体缔造。作品蕴含着对殖民地女性、对殖民地所有个体命运追索的映射与警示,喻示着个体及整个后殖民社会获得主体身份的隐秘策略。

关键词:孤儿自传;后殖民女性身份;生育工具;性别压制;协商

中图分类号: I20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838(2018)06-0078-07

杰梅卡·金凯德(Jamaica Kincaid, 1949—),这位旅居纽约的来自第三世界的作家,以其对自己的出生地西印度群岛安提瓜这个后殖民社会的自传式书写,为深受殖民压迫,至今仍生活在殖民历史梦魇中的边缘他者代言,同托尼·莫里森、V. S. 奈保尔等致力于书写少数他者的作家们一道,为当代英语文学增添了异彩和独特的声音。《我母亲的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My Mother*, 1996)是一部典型的关注后殖民主题的传叙作品。首先作品名字便令人费解,“自传”之本意为自我书写,而女儿书写自己的母亲,当属为他人做传的“他传”或“传记”,看似矛盾的书名包含着对殖民地女性命运与历史命运的深刻隐喻。在探讨作品作为后殖民自传的特征之前,有必要先来回顾一下对“自传”这种文体类型的

认识变化。自传的现代学术研究先驱之一、开美国自传研究之滥觞的 Roy Pascal 认为,“毫无疑问自传本质上是欧洲的”^{[1](P22)},“是浪漫主义之后的西方文明的独特产品”^{[1](P180)}。后结构主义论者则认为,不仅非欧洲人,任何人的自传都是不可能的,包括过去像奥古斯都那样以为自己在写自传的人。解构主义的自传观点更趋激进,德里达的助手 Robert Smith 断言:“一旦语言成为自传理论的一个问题,任何‘自传主体’依赖的注脚都不存在了,自传主体已经彻底解体了”^{[2](P58)}。因而非西方自传的研究者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去分析解释一种本质上不存在的东西。对此斯皮瓦克提出了解决方案,她认为主体性并没有完全被语言囚禁,任何能够提出“我是谁”这个问题的人,即有自我意识、体察到“问题自我”

收稿日期:2018-08-09

作者简介:都文娟(1978—),女,济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当代英语小说、传记理论与后殖民理论研究。

的存在的人,都可以成为自传的主体,并且指出这是一切非欧洲人撰写自传的前提^[3]。自传批评的第三次浪潮采取了类似的思路,通过调和文本的社会建构与自我解放的主体,揉和后现代与后殖民的关系,来恢复自传的地位。这些批评家以后结构主义统一的主体性为前提,表面上消解了自传的可能性,但仍然认可自传的解放性功能。比如 Paul John Eakin 就一方面承认任何连贯的自我都是一种幻觉,同时又提出“自我与其说是一个实体,不如说是一种过程中的意识”,并在传统意义上启用“自我性”(selfhood),“展现的自我性”(emergent selfhood)等概念^[4]。植根于西印度群岛这个后殖民语境的自传文本,虽然外在于诞生在欧洲文化语境的自传传承,但它们所关注的独特后殖民经验,对语言、身份、女性及存在问题的探索,本质上是对欧洲自传精神的承袭与开拓。

金凯德在安提瓜度过青少年时期,17岁后到纽约定居。她的创作具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写作之于金凯德,是释放过去痛苦记忆的一种方式,也是建构其“有意义的、适当的写作者自传和写作者身份”的一种方式^[5]。《我母亲的自传》讲述的是发生在金凯德生活过的西印度群岛圣约翰与罗索两个城市的故事,有关家庭、学校等的细节多基于金凯德的真实经历。然而,《我母亲的自传》并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以传记式“真实”为旨归的自传,而是如同诸多后现代时期的生平书写一样,巧妙地将自传特征与小说维度相融合,加之作品的后殖民语境,便成就了一部后殖民主体建构的典型书写。作品的中译者路文彬先生在后记中指出,作者对英国殖民文化的抗拒,对受殖民统治异化的本土种族的憎恶,对生命的仇视等,汇聚成极端的愤怒情绪,限制了作品的意义升华,影响了作品的深度。

一、后殖民孤儿的独特存在

孤儿生平自传与孤儿小说不同,前者具有作者、叙事者、孤儿传主三重视角的统一性,而孤儿小说的作者与叙事者或传主是分离的,甚至不具有明显可辨的相似性^[6]。《我母亲的自传》的第一人称叙述者雪拉与作者金凯德在境遇方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可以说是作者的自传叙事,另

一方面,金凯德并不是真正的孤儿,虚构的名字雪拉也与作者的真实身份拉开距离,使故事具有了普遍的意义,可以是任何一个后殖民地女性的故事。作品便在这种实与虚的张力中获得了讽喻的力量。

自传叙事通常从讲述自己的身世开始,《我母亲的自传》开头便是关于“我”的身世的叙述:“我的母亲生下我就死了”^{[7](P1)}。“我的父亲带上我,将我交给他出资雇佣为他洗衣服的那个女人照看。”^{[7](P2)}母爱的缺失,使新生儿失去庇护,变得脆弱无助;父亲的再次遗弃,则将雪拉置于完全丧失父母亲情的孤儿境地。而负责照看她的养母尤尼斯妈妈,作为六个孩子的母亲,除了发酸的奶水,什么都不能给予孤儿雪拉。

讲述自己的家系渊源是回顾性生平叙事的另一个重要任务,雪拉也渴望复原自己母亲的故事。不幸的是,雪拉的母亲也是一个遭父母遗弃的孤儿,她父母的历史根本无从追述,仅剩的是她被抛弃在法国人开办的修女院的故事,故事的简单苍白留给雪拉的是身世的断裂与缺失。雪拉的自传,即是孤儿的自传,这种自传书写不可能是面向过去的发现和寻找,因为过去一无所有,它必然是一种自我创造,是面向未来的、成为什么的构建。

不止主人公雪拉是孤儿,那些总欺侮她的尤尼斯妈妈的孩子们,也不比她强多少。他们没有父亲,虽然表面上有母亲,但她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身心的关爱与庇护,他们心中的母亲位置是空缺的。还有雪拉同父异母的弟弟和妹妹,父母对他们的忽视与冷漠也让他们形同孤儿。另外,雪拉的父亲少年时被他的父亲欺骗与遗弃,白人菲利普夫妇也不过是被母国流放到殖民地的孤儿。死亡、遗弃、流放,殖民霸权影响的无所不及,导致了在殖民地失去亲人和家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畸形的后殖民社会令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一样,与自己的亲人、土地、家园、历史、文化疏离,沦为没有亲人,没有归属,无所依附的孤儿。个体的孤儿无所不在,整个后殖民地也处于一种孤儿状态。出身贫穷落后,先是被殖民母国无耻劫掠,继而又被无情遗弃;在被殖民过程中,自身

的历史已被篡改,文化也趋于磨灭。《我母亲的自传》承载着一种历史责任,它不像传统自传那样致力于挖掘家世渊源和描述个体向主流价值的归属与认同,而是创造性地书写个人历史,成为自己的造物主。雪拉自我身份的确立,不仅对所有殖民地孤儿具有借鉴意义,更是殖民地发现自我,塑造自己独立的文化身份、民族身份,成为自己的缔造者的象征。

二、拒绝殖民异化,确立自我价值

殖民地孤儿不仅缺少幸福快乐的童年,还必须在这个缺少温情与爱,人人相互憎恨的环境中,掌握生存的智慧,抵制畸形殖民文化的异化,免于陷入永远被否定、被剥削的蒙昧状态,对自己的存在获得清醒的认识,争取生存的权利。

作为对尤尼斯妈妈的无情与冷漠的反抗,雪拉长出牙的第一件事就是咬她的手,还打碎了她奉为至宝的瓷盘,粉碎了她将不曾见过的遥远的英国乡村奉为人间天堂的幻想。在学校的反抗给雪拉的境况带来了有益的转变。雪拉的老师,这个本应肩负起启蒙的责任,给这些在家中得不到爱与关照的孤儿们以价值与方向,给他们带来希望的老师,却因为自己的非洲裔种族特征而自卑、痛苦、绝望,并为之感到屈辱和自我厌恶。她在雪拉身上看到的是可鄙的、失败的加勒比劣等种族的特征,她认定雪拉是邪恶的,便憎恨、折磨她。这位非裔老师已完全内化了殖民者的价值标准。在她的影响下,懵懂的孤儿学生也成了殖民文化的帮凶。随着知识的增加和年龄的增长,雪拉自我意识萌发,想知道“我是谁”。缺少交流的对象和有意义的指引,雪拉开始给唯一的亲人——想象中的父亲写信,写自己的委屈与愿望,她想讲给梦中的母亲听的话。这些信从未发出,但老师的告状意外地让父亲读到了这些信,激起了他做父亲的一丝温情,竟把她接回了家。尽管这个家残缺不全,却为孤身流浪的雪拉提供了一个暂时的庇护所,挽救了这个在感情的荒漠中濒于枯萎的生命。

这个戏剧性转变给雪拉一个启示,她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可以表达出来,可以利用某些手段去实现自己的需要。明白了在这个冷漠的世界,没

有人具有爱的能力,想要生存下去,只能依靠自己。这是雪拉对自己力量的首次确认,这种认识逐渐练就了她不依赖、不信任任何人,独立求生的能力。她自己做饭吃,躲过了继母的毒项链阴谋,自行堕胎,干重体力活养活自己,一步步达到完全的自立。虽然饱尝艰辛,可这却是殖民地女性免于被控制,确立自己的独立身份与地位的必由路径。

雪拉对自己内在力量的认识,伴随着对自己外在种族体貌特征的接受。她的自我欣赏、自我凝视,标志着她达到了自我认同的新高度。回到父亲家的雪拉得到的是继母的冷漠、嫉妒、敌意,父亲一贯的漠然与忽略,以及弟弟妹妹的嫉恨与排斥。他们仰慕殖民者的白人文化,连自己都憎恶,更不可能爱雪拉。雪拉以自己种族的生理特征为审美标准,欣赏并接受自己。无法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她便做自己的恋慕者,从他者的视角欣赏镜子中的自己。“我身上一切引起别人反感的東西,都是我天生的東西”,“我怀着全身心的热情,爱着我身上的这些东西”^{[7](P26)}。萨特认为,他者的在场是自我存在的先决条件,“他人是我和我本身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通过他人的显现本身,我才能像对一个对象作判断那样对我本身作判断”^[8]。可贵的是,雪拉并没有因为他者关注的缺席,而迷失自己,她放弃向他者的求取,勇敢地返回自身,做自我的注视者、观看者。确立独立的审美标准,认可自我存在,是雪拉实现自我成长与认同的关键一步。

这种自我之爱、自恋之爱,在后殖民语境下获得了新的意义,它是爱的荒漠中的绿洲,是被压抑的个体和被磨灭的民族精神得以生长的精神根基。只有在这种深切的自爱和对自我的关怀中才能保持本真的自我,对自己身体特征的欣赏,是对自己民族性的肯定,唯其如此,才能使被殖民者免于落入自我殖民的陷阱。

三、对后殖民境遇下女性角色的抗拒

拉巴特先生与妻子莉莎的关系是典型的被异化的殖民地男女的婚姻关系。

雪拉将近成年时,父亲把她当作商业利益交换的筹码,送到了位于罗索的拉巴特先生家。拉

巴特先生对于这块送到嘴边的鲜肉,似乎并不特别在意。“他并不在乎我父亲请求他提供住宿的是我,还是别的什么人。他喜欢我父亲那种不事张扬的贪婪,我父亲喜欢他那种朴实无华的贪婪。”^{[7](P53-54)}“他不想同任何女人结婚。她们愿意为他生孩子,假如是男孩,这些孩子便取上他的全名,但他从来不和这些孩子的母亲结婚。”^{[7](P52)}莉莎巧设圈套用魔力让拉巴特先生与她结婚,她的战利品却很快透支了她,吸干了她的生命精气。她虽然拴住了他,但“他不会被拥有,不会被占据”^{[7](P61)}。她转而一心把自己嫁接到拉巴特先生身上,但他只知道索取,无力给她的生命哪怕是一丁点儿而的滋养。当她耗尽生命去攫取一点爱与关照而不可得时,便从内到外地枯萎了。最终她想要个孩子,一个拉巴特先生的孩子,幻想能与这个孩子建立一种自然的关系,幻想这个孩子会依赖她、属于她,能对她的爱有所回应。“但她的子宫像个筛子,容纳不住孩子。”于是,她想让雪拉给她生一个拉巴特先生的孩子。

对于雪拉的到来,拉巴特先生是麻木的,而对于跟她的关系可能带来的束缚,他出于惯性是逃避的。但雪拉与拉巴特先生的妻子莉莎的相遇,却给她带来了一次难得的友谊。可是莉莎自身的状况和她对雪拉的企图,让雪拉看清了自己的未来命运。这个企图把雪拉置于生育工具的代用品的位置,惊恐的雪拉作出本能的反抗。雪拉意识到一旦在这个家里怀孕生育,自己便会跟莉莎一样陷入在物质生活上、感情上、精神上完全依附于拉巴特先生的境地,而这个男人只是物质财富的奴隶,行尸走肉般的影子,没有情感的空心人。雪拉在莉莎身上看见了自己的未来。同时,雪拉也不愿意把一个新的生命带到一个缺少爱的环境中,让他被忽略、受折磨,甚至死去。当她发现自己怀孕后,即用古老的偏方打掉了体内的孩子,用极端残忍的方式亲手改变了命运的安排。身体稍微恢复之后她毅然离开了拉巴特先生的家,靠体力劳动养活自己。

中译者路文彬先生指出,“雪拉拒绝生育这一行为,表现出的不仅仅是对于现实的不合作态

度,更是对于自我民族历史生命的悲壮自绝”^{[7](P194)}。那么金凯德的代言者雪拉是否仅仅是出于“不合作”与“自绝”的“仇视生命”?雪拉对于被当作生育工具的抗拒,最初是源于恐惧,反抗也是本能,是无意识的。从拉巴特家里出走之后,在自食其力的体力劳动过程中,她慢慢获得了力量,清楚了自己选择的意义,坚定了决心。“我的生命超越了虚空。我从未拥有过母亲,我仅仅是在最近拒绝了成为一个母亲,而且我知道这种拒绝肯定能够实现。”^{[7](P77)}雪拉之所以不愿成为母亲,是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尚且没有母亲,不知道自己是谁,不能作为一个真正的母亲去爱、去给予,去引领自己的孩子,与其带他们来到这个世界,让他们被忽略、受折磨,枯萎而死,或行尸走肉般活在孤寂、绝望中,不如在他们出生前就杀死他们。雪拉的选择残忍而决绝,却是可以理解的:在成为“我自己”之前,“我”无法成为母亲,不配成为母亲;而在成为“我”之后,别人也成为他们自己的时候,孕育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她为自我抵抗,也为自己的孩子们抵抗。因而她不惜以惨痛的代价,维护自己选择的权利和选择的自由。

在雪拉所处的后殖民社会,本土男性作为受殖民文化压迫、异化的阶层,接受白人文化又无法完全认同,鄙弃自己的民族特征又不能完全去除,在夹缝中变成了空心人,失却了主体性。而植根于民族传统较深、较为弱势的女性,则沦为他们汲取生命力和证明他们存在与权力的工具。因而殖民地女性,首先是本民族男性剥削的对象,是他者的他者、属民的属民。但雪拉认识到这种压迫的存在,并进行了直接的反抗。更多的女性是像莉莎一样作为男性的帮凶,既束缚自己的身心,又陷害其他女性。在她们眼里,女人就应当为男人占有,为他们生儿育女是天职。生育是她们证明与男性的联系,表明自己存在的唯一方式。可以说殖民地女性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已经缩减为一个子宫,一个生儿育女的工具。

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伊莉格雷(Luce Irigaray)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性别差异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如果对这一问题进

行了彻底思考,我们就可以得到思想上的拯救。20世纪以来,无论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还是拉康的“费勒斯”中心主义,只是对男女性别差异的解释略有不同,实质上都推崇男权至上理论,是从生物本质主义立场来判定性别优劣的理论。斯皮瓦克策略性地从这种本质主义立场出发,讽刺性地对“阴茎嫉妒”进行了解构,提出了“子宫嫉妒”(womb-envy)与之抗衡^{[9](P45)}。她认为,子宫是人类生产的场地,作为女人,既孕育于子宫,又拥有使用自己的子宫孕育子女的权力。金凯德的自叙者雪拉已经突破了男性中心主义的限制,认识到女性的创造性力量。不仅如此,她还突破了一般女性狭隘的“子宫中心”的角色限定,认识到母亲身份并不是女性身份的全部,亦不能先于女性主体身份的确立。借此她宣称的是对女性生育权利的控制,解构了殖民地女性普遍接受的,把母亲身份置于女性主体身份之上的错置。

四、两性关系与后殖民社会的出路

雪拉在两性关系上对自我的创造,是对独立的女性身份与地位的追求。拒绝成为母亲的雪拉,还需要解决自己要成为什么的问题。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没有任何财产与社会地位的殖民地女性,与父亲继而与丈夫的关系,是她的生活的主轴,是命运所系。一无所有的殖民地女性,如何生存下去,并在这个世界获得一席之地?如何能够忠于自己的内心,不抛弃自我,能够倾听自己内心的需求,能够拥有满足自己需求的权利?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没有自己独立的主体地位,仅是男人合法占有的私有财产,女性的性愉悦由于不是女性生殖过程的必要部分,从而一直被忽视,被排除于主体的男性愉悦之外。建基于男权中心与欧洲中心主义的精神分析学说不仅将女性的子宫视为一种缺失,挪用了女性的子宫,也用“阉割焦虑”消解了女性的性欲需求。为此,斯皮瓦克提出这种对女性性愉悦的压抑事实上才是对女性的精神阉割^{[9](P151)}。当作为失败者种族的殖民地男人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时,只能通过消费比他们地位更低的女性,来确证他们的生命存在,索取爱与生命活力。满足男性需求是

雪拉这样的殖民地女性的主要社会功能,她们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或意义,满足男人的需求,成为她们存在的唯一目的。她们自己的需求已完全被遗忘,作为土著女性的体貌特征更是她们痛苦的根源、憎恨的对象。就像非洲一些地方对女性实施的残酷割礼,肉体上的否定和精神上的残害相辅相成。令人欣慰的是,雪拉通过对自己种族历史和遗传特征的认可与能动的自我意识,以及对女性性需求的接受与把握,摆脱了作为男性性欲客体的地位,在与男性的关系中占据了主导甚至是支配性的地位。

在与拉巴特先生的关系上,对于她生命中的这第一个男人,她“相当确信地说,我知道什么才是我想要的……”^{[7](P57)}这种以自我感受为主,不取悦、不迎合的女性意识,不同于拉巴特先生的妻子莉莎,以满足男人的需求为中心,以俘获男人的身体为荣,以与之结婚为终极目的,以想方设法为他生个孩子来维系他对自己业已消失的兴趣为最后的救命稻草,以致完全失去自我。相比之下,雪拉的这种主体意识是很大的超越。

在与罗兰的关系上,雪拉的女性主体身份又得到进一步完善。罗兰是本土民族的代表,他与土地的关系最为紧密,是原始生命力与狂野之美的凝聚。他们彼此吸引,深爱对方,“我能感受到自己充满了幸福,但那是一种我以往从未体验过的幸福”^{[7](P132)}。但是他也是一位哨兵似地守卫着他的女人的丈夫,这个女人手里还有一长串包括雪拉在内的女人的名单,她为守卫自己的战利品愤怒、打架。可是雪拉说:“我认为为一个男人打架,有失我的尊严。”^{[7](P138)}罗兰虽然真实、高贵、富于原始生命力,蔑视物质利益,但他把征服女人当作自己的生命意义所在,把女人看作自己的财产,当作生育子嗣延续自己存在的中介。他的自我是缺失的,他不知道除了俘获女人和延续自己的生物存在,生活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因而罗兰也是寄生性的,没有自我,亦不能给予他人力量,仅是一股吞噬性、毁灭性的原始力量。认识到这一点,雪拉便没法再去爱他。

在与丈夫菲利普,一个英国征服者的关系上,在别人看来,雪拉的这种婚姻让她跻身优越

的上层特权者的行列,代表着被征服者对征服者的胜利。菲利普很爱雪拉,出于对她充盈着生命力的身体的痴迷,对她所代表的神秘的本土文化的好奇,他欣赏她、渴望她。但雪拉并不像别的殖民地女性那般梦想嫁个丈夫,“这种话从来没有从我的嘴里蹦出来过:‘我嫁给他是因为我觉得他有安全感’,或‘我嫁给他是因为我觉得他会是一个好靠山’,”^{[7](P119)}。菲利普的白人相貌也不合雪拉的理想:“他的皮肤很薄……皮肤下的血管乱作一团……他长得不像我可能爱的任何一个人,他长得不像我应该爱的任何一个人,所以那时我决定不能爱他,我决定不应该爱他。”^{[7](P124)}他代表的是征服者的文化,爱他就意味着对其文化的屈服,以及对自己文化的背离,所以她不能爱她。但菲利普对她的迷恋让雪拉认识到作为女人的力量与价值,自己所代表的被征服民族文化的价值,尽管不应该爱他,她还是嫁给了他。

像雪拉这样呆在自己的土地上,说着殖民者难以理解的语言的被征服者,才是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他们在很多方面拥有反过来控制像菲利普这样抛弃了自己的祖国远道而来的征服者的权利,可以说一定意义上他们是殖民者的主人。因而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是双向的,但无论如何被役者和主人无法成为朋友。“我没有打算给他带来平静(就像他没有打算给我带来平静一样),我也不可能打算给他带来平静。”^{[7](P126)}雪拉在跟三个男人的关系上,始终都在努力抵制民族等级及性别等级的扼制,抗拒殖民意识形态与男性中心意识的他者化,不屈服于殖民威权的控制或男权的压制,在对他们的权利的消解上,达到一种保持自我、塑造自我主体的目的。至此,雪拉用自己的抗拒与挣扎,创造出了一个真正的殖民地女性主体,达到了为自己立传的目的。处于矛盾对抗状态的殖民与被殖民文化,干扰辄着殖民地人民尤其是女性的主体意识,但孕育与再生的空间也在二者的夹缝中敞开着。雪拉在两种处境的中间地带,在两种经验的交集中寻求再生,试图在打破一方对另一方的幻想及扭曲的期待的基础上,实现二者的交流与对话。整个后殖

民社会,包括殖民阶层与被殖民阶层在内,所欲寻求的出路,正寓于此。女性传记叙事与后殖民叙事题旨的一致性呈现出来。

女性通常被认为是代表民族文化身份的主要依靠力量,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认为文化身份是一种未完结的“生产”,是共同性之外的“断裂”与“差异”规定了身份的位置,非洲的在场,欧洲的在场和美洲的在场同时界定了加勒比人的文化身份^[10]。雪拉在与代表这三种力量的男性人物的平等对话的过程中进行交流与协商,不被同化,也不试图改变或压迫对方,也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真正独立、“合法”的个人与文化身份。

五、结语

不理解自己的父母便无法理解自己,雪拉的主体塑造是在对父母的进一步理解,以及与父亲的和解中完成的。给了她生命的父亲,是她无法去爱的谜一样的存在。然而真正理解了他的成长经历之后,雪拉便对他多了一些怜悯。他是苏格兰父亲与非洲裔母亲的结合,非洲裔的部分是他所鄙视和努力驱除的,但他在摆脱那些贫穷、多病、点头哈腰、麻木不仁的被打败、被征服的非洲裔特征的时候,也丢掉了自己作为人的善良、关爱、真诚等基本的情感,成了一个残酷无情、唯利是图、面具长成皮肤的虚伪压迫者、征服者的一员。

雪拉的母亲是残存的加勒比族裔中的一员,出生便被遗弃,她不是征服者,也不是被征服者,没有历史,也没有未来。对父亲来说,作为第三者的加勒比族裔,不仅不会直接勾起他的耻辱或伤痛,反而激起了他的优越感与怜悯之情。雪拉的母亲,“甚至在她出现在我的梦中时,我也从没看见过她的脸庞,我只看见了她的脚背、她的脚踵,当她从梯子上下来的时候,她那双赤裸的脚不停地向下……”^{[7](P160)}加勒比族裔的母亲除了双脚仍然踏在自己的土地上,其余一切特征都被抹杀了。然而赤裸的双脚不足以支撑一个异己的生命,她只能向下坠落。对于这脆弱、悲伤、坠落中的生命,父亲是一股无法抵御的入侵力量,一年之内便榨干了她仅存的生命力。

真正理解了自己的父母,雪拉终于完成了自我身份的构建。《我母亲的自传》具有独特的后

殖民自传特征:融入社会的失败,价值归属的矛盾,身份与主体的分离,传主形象的晦暗不明,指向社会所认可的价值目标的线性推进过程的缺失。同时,传主不管是认同民族身份,还是融入殖民文化,都意味着与另一半自我的疏离,传统自传叙事遵循的融入主流价值体系,达到与先在统一的主体相认同的理想不复存在。这与奈保尔的形蜕即形成(deformation/formation)^[11]的概念如出一辙,金凯德的这部自传以自我形蜕的形式对此作出了创造性回应。《我母亲的自传》是金凯德在后殖民历史情境下对传统自传叙事的多维创新,是一种新颖的自传叙事模式。

参考文献:

[1] Pascal, Roy. *Design and Truth in Autobiography*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2] Smith, Robert R. *Derrida and Autobiography*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3] Berger, Roger A. *Decolonizing African Autobiography* [J].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2010, 41 (Summer): 32-49.

[4] Eakin, Paul J. *How Our Lives Become Stories: Making Selves* [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27.
 [5] Bouson, Brooks. *Jamaica Kincaid: Writing Memory, Writing Back to the Mother* [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3.
 [6] Everett, Julin. *The Postcolonial Orphan's Autobiography* [J]. *College Literature*, 2009, 36(9): 45-62.
 [7] [美]杰梅卡·金凯德. 我母亲的自传[M]. 路文彬,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2.
 [8] [法]萨特. 存在与虚无[M]. 陈宣良,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7:292.
 [9] Spivak, G. Chakravorty.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M]. New York: Methuen, 1985.
 [10] 赵稀方. 历史与理论[M].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14:2.
 [11] Riquelme, John Paul. *Modernist Transformations of Life Narrative: From Wilde and Woolf to Bechdel and Rushdie* [J]. *Modern Fiction Studies*, 2013, 59(3): 461-479.

In Search of the Post-Colonial Female Identity: On *The Autobiography of My Mother*

DU Wen-juan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250022, China;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The Autobiography of My Mother* distinguishes itself from the autobiography family for its special concern about post-colonial identity. This book both inherits and develops the European autobiography genre since it is not only concerned about identity but explores along different path and with different strategy. Family identification and historical origin are replaced by future-oriented creation of new identity;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mainstream culture is replaced by resistance; the fate to be productive tool is warned against; the quest of female status and right is conducted in sexual relationship and marriage, which are all significant strategies to establish the post-colonial female identity. This book reflects the struggle of women in post-colonial environment, and implies the secrets for all individuals and the entire post-colonial society to pursue their identity.

Key words: autobiography of orphan; post-colonial female identity; productive medium; gender hierarchy; negotiation

(责任编辑 赵莉萍)